

中國史學家傳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丛书

中国史学家传

张舜徽 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沈阳

中国史学家传

Zhongguo Shixuejia Zhuan

张舜徽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屋2号)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字数: 264,000

开本: 787×1092 $\frac{1}{2}$

印张: 13 $\frac{1}{2}$

印数: 1—31,000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袁闾琨

责任校对: 马玉德

封面设计: 赵多良

统一书号: 11090·106

定价: 1.15 元

前 言

我国是文明古国，已有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古往今来，许多历史学家，竭尽其毕生精力，把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悠久历史形诸文字，编写了各种体裁的历史著作。从这些著作中，反映了他们孜孜不倦、刻苦钻研的精神与聪明才智，也反映了他们珍视祖国丰富的历史遗产的爱国热忱；更可贵的是在这些卷帙浩繁的历史著作中，详细地记载了我们的祖先征服自然、改造环境、治理国家、移风易俗等过程，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技术、社会生活，无不罗列备至。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去粗取精，除伪存真，使古为今用，这对于我们今天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有着积极的意义。要从历史著作中发掘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必须先对中国史学家及其代表作品有一些了解，这对于初学历史的人来说，存在一定的困难，或甚至有不知从何着手的。我们有鉴及此，特组织人力，分工协作，编写了这本书。在介绍各史学家及其著作情况时，特别注意介绍他们勤奋学习、克服困难的过程及从事历史研究的方法与经验。希望读者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和帮助，在历史研究的

领域里迈步前进，不断取得一些成就。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曾组织会员编写过《中国历史学家传注》，在这一基础上，编写了这本《中国史学家传》，定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丛书的一种。这本书主要是为中学师生、大学文科学生、社会各条战线上爱好历史的青年编写的。应加以说明的有两点：

一、关于选择史学家的问题。本书专门介绍我国历代的史学家，对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力争收集得齐全一点，但由于各种原因，尚难以达到目的。鉴于女史学家罕见，特为班昭独立一传。凡对史学有一定贡献的，除今天还健在者外，都加以选入。至于现代已故的史学家，他们中不少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历史，为建立中国的新史学作出了贡献，我们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为给他们立传做了初步工作。

二、关于编写体例问题。本书是普及历史知识的通俗读物，有的稿子引用史料较多，文字艰涩难懂，我们进行了删削，或根据原意改写为语体文。本书在介绍历代史学家的个人生平、史学研究成果及学术地位时，着重突出其在史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对个人生平，力求简明扼要。但有的史学家同时又是政治家，对其政治活动只能稍加涉及，侧重在史学上的活动和成就。

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多是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员，还有会外的专家。本书所选入史家，经历不一，各有特点，因此，各篇风格不同，各有特色，从字数到文体，从深度到广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未求得完全一致，这

样做是否有益于读者阅读，敬希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

参加本书通稿工作的有王瑞明、崔曙庭、陈抗生、蒋志杰四同志，最后由张舜徽教授审阅定稿。辽宁人民出版社的同志对本书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多已采纳，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中国史学家传》编辑组

一九八一年六月

目次

前 言

司马迁 { 1 }

班 固 { 8 }

班 昭 { 14 }

荀 悦 { 17 }

譙 周 { 20 }

陈 寿 { 25 }

司马彪 { 30 }

常 璩 { 34 }

袁 宏 { 37 }

裴松之 { 40 }

范 晔 { 44 }

臧荣绪 { 48 }

沈 约 { 50 }

崔 鸿 { 54 }

萧子显 { 57 }

魏 收 { 59 }

姚思廉 { 63 }

李百药 { 67 }

李延寿 { 71 }

颜师古 { 75 }

令狐德棻 { 79 }

刘知几 { 83 }

吴 兢 { 89 }

杜 佑 { 93 }

薛居正 { 98 }

王 溥 { 101 }

宋 祁 { 105 }

欧阳修 { 110 }

司马光 { 116 }

刘 攽 { 122 }

刘 恕 { 128 }

范祖禹 { 132 }

郑 樵 { 135 }

李 焘 { 141 }

徐梦莘 { 147 }

袁 枢	(150)	魏 源	(259)
李心传	(153)	夏 燮	(263)
王应麟	(157)	汤 球	(268)
胡三省	(161)	李铭汉	(272)
马端临	(166)	洪 钧	(275)
柯维骐	(171)	柯绍忞	(278)
李 贻	(174)	屠 寄	(280)
陈邦瞻	(178)	孟 森	(283)
谈 迂	(183)	梁启超	(286)
查继佐	(187)	王国维	(293)
黄宗羲	(192)	连 横	(298)
顾炎武	(196)	吴玉章	(303)
王夫之	(203)	柳诒徵	(307)
谷应泰	(208)	李剑农	(311)
马 驊	(211)	陈 垣	(317)
万斯同	(214)	吕思勉	(325)
浦起龙	(219)	邓之诚	(328)
全祖望	(221)	金毓黻	(333)
王鸣盛	(226)	陈寅恪	(338)
赵 翼	(229)	郭沫若	(342)
钱大昕	(235)	范文澜	(348)
章学诚	(241)	顾颉刚	(354)
崔 述	(246)	翦伯赞	(360)
邵晋涵	(250)	向 达	(364)
徐 松	(255)	吕振羽	(371)

华 岗 (378)

何干之 (383)

齐思和 (390)

童书业 (396)

吴 晗 (401)

邓 拓 (407)

附录：中国史学家简表

司 马 迁

(公元前145—前89? 年)

司马迁，字子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因县北有龙门山，所以又说“迁生龙门”。司马迁幼年时代，家庭原以农牧为业。他的祖先世代为“太史”（史官）。父亲司马谈有渊博的学问，这就使司马迁自幼接受了很好的教育。

司马谈很早就立志要做一名历史学家，随着学识的积累，治史的兴趣越益浓厚。他对自己的远祖做过“太史”这个官职，非常敬慕，终于在汉武帝建元、元封年间，充任太史令。太史令通称太史公，在汉代是掌管国家图书及天文历算并兼管文书和记载朝廷大事的史官。由于史官有条件接触朝廷保管的大量图籍文献，司马谈经过长期的努力，终于成为当时著名的学者。他为写一部能真实反映社会面貌的史书尽了一生的努力。这为司马迁后来撰写《史记》提供了许多资料。司马谈所著的《论六家要旨》，是一篇总结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思想发展史的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文。文中对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六个主要学派，即“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分别加以评论，指出各家的长短得失，它至今仍是我们研究先秦

思想史、哲学史不可不读的珍贵文献。

司马迁在其父的严格教育下，从十岁便开始读《左传》、《国语》、《世本》等历史文献。司马谈在做了太史令的那年，就把司马迁带到了京师长安，使年幼而求知欲旺盛的司马迁，得以有机会向当时的古文大家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向今文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还向其他许多当世有名的学者学习。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努力，扩大了司马迁的视野和知识领域，为他后来成为渊博而有创见的学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胸怀大志的司马迁，经过博览群书之后，觉得研究历史除了读经传史籍外，还必须亲自游历祖国的名山大川，考察古代遗闻轶事，访贤搜史，了解风俗民情。于是在他二十岁的时候，便从长安出发，开始了他的游历和考察活动。他先南游江淮。当他经过汨罗江的时候，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到了长沙时，又察看了西汉杰出的政治家贾谊的遗迹。在湖南，司马迁还专程前往九疑山瞻仰了传说中的虞舜坟墓。然后转道湘西，顺沅江而下，东浮大江到了浙江。司马迁为了考察夏禹的遗迹，而有“上会稽，探禹穴”之举。结束了对会稽的考察后，司马迁便渡江北上，到了江苏淮阴。这里是汉初“三杰”之一韩信的故乡和封地。在这里，他搜集了关于韩信的“漂母饭信”、“胯下之辱”等故事，后来都写进《淮阴侯列传》中去了。接着，司马迁又“北涉汶泗”来到了孔子的故乡山东曲阜，“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峰”。司马迁拜谒了城北泗上的孔子墓，考察了有关孔子的事迹，看到了齐鲁的士人经

常到这里来祭奠孔子，使他对孔子无比的敬佩。自峰山向南走就到了薛县，这里是战国四君之一齐国孟尝君（田文）的封地，司马迁深感当地的民情风俗与邹鲁有所不同。他在附近采访了许多反映战国时期“好客养士”之风的珍贵史料，所以后来他的《孟尝君列传》一文写的那样丰富多彩，生动活泼。自薛县再向南，就到豪杰辈出，楚汉交战时必争之地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司马迁在彭城及其附近一带遍访了当地父老、文人，考察了历史遗迹，掌握了大量有关楚汉相争以及汉初的历史资料，这些都分别地写入了《史记》的有关篇章之中。司马迁游访了薛县、彭城之后，“过梁楚以归”，回到了长安。

司马迁回到京师不久，便做了汉武帝的郎中。这是一名在宫内侍从皇帝的小官。司马迁的入仕，一方面使他能够深刻地了解汉朝最高统治集团的内幕，同时也使他得到更多的机会随从皇帝去祭告山川，游览祖国各地。不久，司马迁“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qióng穷）、笮（zuó作）、昆明”。西南地区的地方政权臣服之后，汉代疆域得到扩大和发展，西汉政权达到了鼎盛阶段。这时好大喜功的汉武帝举行了封禅活动。这次封禅活动是在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〇年）举行的。跟随汉武帝封禅的太史令司马谈，因途中身染重病，被留在洛阳。恰在这时，司马迁奉使西征归来，听说父亲病了，来不及向汉武帝覆命，便急忙赶到洛阳探望病危的父亲。司马谈悲伤地执着手并嘱咐说，我的祖先在周朝是担任太史的，后世衰落了，难道到我这里会断绝这个职务吗？你如果能

再作太史，那就是继承先祖的事业了。我死之后，你一定为太史，为太史不要忘记我想要写的史书啊。今天的汉朝，海内一统，出现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我为太史而不去论载他们，国家没有史书留传下来，我是非常忧惧的，你应当谨记这一点。司马迁低垂着头，一边流泪，一边答应着说：“我一定遵照您的意思去办，决不敢违背。”当年，司马迁三十五岁。父亲死后，他随即赶到泰山向武帝覆命，并参加了封禅大典。

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一〇八年），司马迁继承父职做了太史令。这时他便有了更多的机会阅读宫廷收藏的典籍文献和收集各种重要史料。由此，开始了著述《史记》的准备工作。以后不久，他又受诏主持了改革历法的工作。汉承秦制，汉初沿用秦代通行的《颛顼历》。这种古历与天象多有不合，有不少缺点，于是在元封七年，武帝接受了司马迁等人的建议，诏令制定新历。经过半年时间，制成了新历，称作《太初历》（即夏历）。《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既符合天象气节，也适合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所以这次改革在历法上是个重大的进步。完成了这次改历工作以后，司马迁就全神贯注地开始了他的《史记》的著述工作。

五年以后，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九九年），发生了“李陵案”。所谓“李陵案”，就是“飞将军”李广之孙李陵受命迎击匈奴，在一场激战中，因为寡不敌众，后无援兵，人尽粮绝，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下，最后兵败被俘，投降了匈奴。当朝廷议论李陵投降事件时，正直的司马迁

在武帝面前极力为李陵辩护，因而触怒了专横的汉武帝，于是把司马迁下狱治罪。一年以后，武帝又闻李陵在匈奴受到重用，便下令抄斩了李陵的全家，并将司马迁定为“诬罔主上”的罪名而处以腐刑。司马迁受到腐刑之后，忍辱发愤，继续著述《史记》。天汉五年，司马迁五十岁这一年，出狱后做了中书令。汉朝的中书令，是在皇帝左右执掌机要的显职，这更有利于他的《史记》撰述工作。大约在汉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九〇年）司马迁五十五岁左右，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奋斗，终于完成了闻名古今中外的史学巨著《史记》。

《史记》是一部划时代的历史著作，它开创了史书的纪传体例。清人赵翼说：“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这种纪传体史书，在封建社会沿袭了二千年之久，从《史记》至《新元史》所谓正史的二十五史，均为纪传体史书。《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余字，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本纪》记载从黄帝到汉武帝三千余年历代的大事，以年月贯穿记载事件的始末；《表》以简明的表格标明错综复杂的事实，又分“世表”、“年表”、“月表”等；《书》记载政治、经济、天文、地理等方面的制度或情况；《世家》记述诸侯王及其世系；《列传》记述官僚、士大夫、名人和有特殊表现的平民的活动。历史学家郑樵在《通志总序》中评论《史记》的价值时说：“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司马迁自己

说写《史记》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它为后人研究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即公元前一世纪以前三千余年的历史，提供了最系统、最完整的史料。

古今史学家还公认“迁有良史之才”，他能采用“据事直书”的史笔，把《史记》写成了“实录”，“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司马迁在《史记》中揭露了汉武帝时期的残酷剥削、压迫人民的黑暗情景，如说“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尤其可贵的是《史记》详细记载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经过。在《陈涉世家》中，司马迁充分肯定了农民起义的作用，指出：“陈涉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此外，司马迁还把起义领袖项羽列为《本纪》与封建帝王同列，把一些平民列入《列传》等等，都是对以前封建史家旧的传统观念的突破，表现了他的进步的历史观。班固对司马迁的思想倾向和《史记》曾经作过比较全面的分析。他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拾）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所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在这里班固所指责的正是司马迁的长处，正是表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和经济思

想特点的关键问题。在议论社会，品评历史人物等是非问题上，他敢于冲破传统观念，因此才“颇繆于圣人”。司马迁为什么“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抬高道家而贬低儒家呢？因为他赞同他父亲司马谈的思想，儒术对于政治是“博而寡要，劳而少功”，道家对政治则“旨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这个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的特点，直接反映了司马迁对汉武帝的好大喜功，连年对外征战给社会经济造成危害的认识。他的“先黄老而后六经”的思想是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状况和苦难人民的要求的。他希望社会能够安定下来，“无为而治”，“休养生息”，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至于“述货殖”，这说明司马迁已经认识到发展经济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象司马迁这样从社会经济角度去考察历史问题，至少在此以前是不多见的。以上就是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总之他强调人和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这是对殷周以来的“天命论”历史观或“循环论”历史观的批判和否定，是历史学的一个巨大进步，它的影响是深远的。

当然，《史记》毕竟是一部封建地主阶级的史书，在根本上它是为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服务的。贯穿全部《史记》的历史观是“帝王中心论”。“帝王中心论”虽然比殷周以来的“天命”史观是个进步，但归根结底，仍是唯心史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明确道出写《史记》的目的就是为了颂扬汉朝廷的所谓“盛德”，宣扬所谓“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这一点也是应该指出的。

（赵吉惠）

班 固

(公元32—92年)

班固，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

班固生活的时代，正值东汉前期，社会比较稳定，生产发展处于兴盛时期，因此，总结前汉经验，更好地巩固其统治，就成了统治者迫切的愿望。

班固出生于封建官宦家庭，又是儒学世家。祖父班稚，哀帝时为广平太守。父亲班彪(公元三一五四年)，字叔皮，为人性情沉静稳重，学问很好，班固之所以能成为一个著名的史学家，与班彪的教导和影响是分不开的。

班彪二十多岁时，正值农民大起义兴起，他乃去天水避“乱”，依附于隗嚣。当时隗嚣被天水一带的豪强拥立为上将军，占据天水、武都、金城一带，想与汉朝争夺天下。班彪乃写《王命论》，论说汉运未终，必当复兴，认为刘秀应天命，必然要做天子，反复劝隗嚣不要争天下。但隗嚣不听，一心想当皇帝。于是班彪就托故到河西隐居起来，终日整理历史，从事著述。

班彪同郡人、河西大将军窦融听说班彪离开了隗嚣，就请班彪担任从事的职务，并以师友之礼接待他。汉光武